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 语言使用中的推理

Inferences in Language Use

熊学亮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目 录

### 第一章 语言符号和语用推理

1.1 语言符号的交际模式 .....	1
1.2 语用推理的交际模式 .....	6
1.3 语用推理和形式逻辑 .....	10
1.4 语用推理的内容规约 .....	14

### 第二章 会话含义推理

2.1 按会话准则推导含义 .....	23
2.2 间接言语行为推理 .....	28
2.3 礼貌原则在推理中的作用 .....	31

### 第三章 关联推理研究

3.1 关联理论是含义理论的升华 .....	33
3.1.1 认知语境 .....	34
3.1.2 显义和隐义 .....	37
3.1.3 架桥推理 .....	38
3.1.4 小结 .....	40
3.2 对关联逻辑的思考 .....	40
3.2.1 关联推理的逻辑性质 .....	41
3.2.2 信息的关联问题 .....	45
3.2.3 关联期待的问题 .....	51
3.2.4 幽默的认知效果 .....	54
3.2.5 小结 .....	60
3.3 关联推理的逆证表述 .....	61
3.3.1 关联推理中的缺省知识 .....	62
3.3.2 关联逻辑和逆向推理 .....	65

#### 第四章 从关联逻辑到非单调逻辑

4.1 语用知识的不确定性 .....	71
4.2 非单调逻辑的典型特征 .....	75
4.3 非单调的临时推理和常规推理 .....	75

#### 第五章 逆证推理

5.1 概述 .....	78
5.2 知识的逆证积累 .....	83
5.2.1 科学发现逆证 .....	84
5.2.2 疾病诊断逆证 .....	84
5.3 侦探破案中的逆证 .....	85
5.4 语用中的逆证 .....	91
5.4.1 语用现象语法化或习惯化 .....	92
5.4.2 宏观逆证推理 .....	94
5.4.3 微观逆证推理 .....	98
5.5 从逆证到缺省推理 .....	104

#### 第六章 缺省推理

6.1 话语假定知识的逻辑模拟 .....	106
6.2 缺省逻辑的扩展 .....	109
6.3 缺省值分析 .....	111
6.4 价值评估性 $\gamma$ .....	117
6.5 框架性 $\gamma$ .....	118

#### 第七章 缺省值驱动的回指解析

7.1 简介 .....	121
7.1.1 Chomsky 的管辖与约束理论 .....	121
7.1.2 新格莱斯语用学 .....	122
7.2 回指的认知语法解释 .....	124
7.3 回指的语篇表征推理 .....	128
7.3.1 FCT 对复杂回指的解释 .....	129
7.3.2 DRT 的回指推理 .....	133
7.3.3 小结 .....	137

7.4	回指的优选推理 .....	139
7.4.1	分析.....	146
7.4.2	余论.....	149
7.5	回指的逆证分析 .....	151
第八章 言语的隐性信息		
8.1	概述 .....	153
8.2	含义和先设 .....	158
8.3	常规推理 .....	159
第九章 先设的局部语境推理		
9.1	先设的特征 .....	166
9.2	硬先设分析 .....	168
9.3	先设的过滤 .....	173
9.4	先设的消失 .....	178
9.5	先设的调节 .....	182
9.6	先设的局部语境调节 .....	185
9.7	先设的心理空间分析 .....	193
9.8	余论 .....	196
第十章 SDRT 修辞推理		
10.1	概述.....	198
10.2	SDRT 的运用例 .....	205
参考书目 .....		213

## 前 言

研究语言使用中的推理,是语用学的任务。学术界有过“意义减去语义学等于语用学”的说法(Levinson 1983:32),是因为一些分析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相信,真值语义学能处置的内容有限,只好把这种语义学无法处理的语用意义或内容,扔进语用学的“废纸篓”进行处理,而篓内的内容并不十分清楚。

一是篓内语用学的纯度不详,激进语义学主义(semanticism)倾向于把一些语用因素纳入语义学的范畴,而激进语用学主义(pragmaticism)则倾向于把若干语义因素归入自己的门下(Leech 1983:4),从而造成了语用学和语义学在内容上的重复。

二是在处理“废纸篓”中的语用内容时,又有“模块说”和“视角说”两种方案。模块说的代表人物是Levinson(1983),他把指示现象、言语先设、会话含义、言语行为和会话结构,看成是语用学的五大基本分析范围,与句法学和语义学形成互补,与语音学、音位学、形态学、句法学和语义学等语言描写平面,呈对应或平行的趋势。视角说的代表人物是Verschueren(1999),他把语用因素与不同语言描写平面上的相关语言成分联系起来,探讨言语和语境的相互选择和适应的过程和状态,并通过这种彼此的“顺应”,建立语言使用的视角分析(perspective on language use)。他认为,音系层上的语音组合、重音等现象,以及其它层次上的言语现象,如英语小品词、言语行为动词的运用,都受到语用因素的制约,因此语用因素似乎成了“经常出没”(haunt)在除了语音层面以外的几乎所有语言描写层面上的“幻影”。

语用学除了研究日常会话内的指示、先设、含义、言语行为、会话规律等方面外,其广博的领域还涉及书面语和社会、科技、专业等其它领域,如语言习得、语言病理学等,Mey(1993:2001)在讨

论社会语用学(societal pragmatics)影响语言使用的社会、意识等因素时,还通过对实际个案的应用性分析,鉴定了语用学自身的元语用学规律。视角说的倡导者 Verschueren(1999:256)在讨论“语用风景线”时,提到 Apel(1989)的超验语用学(transcendental pragmatics)、Habermas(1979)的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Ehlich(1991)的功能语用学(functional pragmatics)等, Schmidt(1974:7)认为,无论把语用学当成是语言学理论的一部分,还是作为自立的语言交际新论看待,都必须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逻辑学、数学、信息系统论、法律学、文学等其它领域相关联。

因此,当今的语用学,早已突破了真值语义学的羁绊,她探讨的是语言使用和意义传递的规律和原则,主要研究的是语用推理现象。

语用推理无所不在,在语言使用时,有时我们并不感觉到什么音系语用学、形态语用学、句法语用学的存在,但在遇到所谓的“花园小径句”(garden path sentence)或歧义句时,解歧就要依赖语用学知识,就要结合相关语境进行语用推理。还有,语言使用时语用者自动遵守经济原则,故导致“惜语如金”的结果。在某种场合内为什么不说“小偷抓住了”或“鸡吃了”,而偏要说“小偷被抓住了”或“鸡被吃了”,这必定有语用原因需要追究。一种解释是:“被”字是被动标记,具有“动词实施的结果给主语造成了负面影响”的含义,这种情感因素可能是使用加“被”字的语法结构的原因,并成为其解释时的制约因素。不启用语用学知识,不进行相关的推理,是很难说清加“被”字和不加“被”字的差别和原因的。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使用规律的学科,语用推理以语言本身的知识为基础,与语言使用时有关的社会心理规律、规则或原则发生关系。语言本身的知识包括语音、句法、语义等方面。与语言使用有关的部分,除了涉及常规或传统语用学所规定的那些范畴或相应部分外,还牵涉相关的概念知识(较普遍)和信念系统(较特殊),这后两种显然与人的认知有关。概念知识指的是语用者对语言使用所涉及的相关世界的有关方面的知识升华,信念系统是语用者生成话语和评估他人话语的依据。这些知识一般不会

直接地想象、体会或感觉到,但在使用语言时,这些知识会自动激活或显现出来。

国外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出了一系列语用推理理论,比较有代表的有:

(1) 言语行为的适宜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 J. Austin 1962; J. Searle 1969);

(2) 合作原则和会话准则(cooperative principle and conversational maxims. P. Grice 1975);

(3) 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 G. Leech 1983; P. Brown & S. Levinson 1987);

(4) 关联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 D. Sperber & D. Wilson 1986);

(5) 顺应理论(verschueren 1999);

(6) 会话公设(conversational postulates. D. Gordan & G. Lakoff 1975);

(7) 善行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 D. Davidson 1973, 1980);

(8) 理性原则(principle of rationality. A. Kasher 1976);

(9) 悲观互动策略(strategy of interactional pessimism. W. Labov & D. Fanshel 1977; S. Levinson 1983);

(10) 透明原则(principle of transparency. M. Dascal 1983)等。

前面5种理论国内介绍、研究和运用得较多,所以我们比较熟悉,而后面5种国内介绍得较少或几乎未见介绍,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与语用推理有关。最近十年来语用学理论和语用推理理论的发展,涉及对一般含义的再界定、对命题表达的内容和语境介入后产生的附加意义的分类和形式表述、将语用原则运用于回指、先设等现象的研究、关联理论的搭桥推理研究、实验语用学、形式语用学、动态语义学等。

当今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得在逻辑的框架内描述自然语言的运行规律或特征,成为一种时尚。所谓的语言形式化处理可以分两步走。

首先,用符号化的方法构成对研究过程及结果的逻辑推论的系统表述,一般是依照几何学的公理方法构建,用若干初始符号

定义初始概念,提出若干形成规则说明符号序列怎样才算合适的公式,合适的公式经解释就成为该系统的公理(徐盛桓 2003)。其次,规定若干转换规则,规定如何从初始公式通过符号的变换而推导出其它合适的公式,这是逻辑推理的阶段性的结果。生成语言学如此,命题逻辑和谓式逻辑也是。

其次,用计算机程序来模拟和处理语言的生成和理解,其步骤是先把有关的自然语言用形式化的方式表述成某种形式的算法(algorithm),再根据算法来编制有关程序。Gabby(1996)认为,自然语言的语义描述,应该是自然语言所对应的 $\lambda$ -表达式及其推演过程,形成的应是用来对自然语言理解的加标演绎系统(labeled deductive system 即 LDS)。

语用推理指的是在字面意义的基础上获得言语追加意义的过程,研究语用推理就是研究有关的规律或规则。语用推理的研究史可参考 Grice(1975)的会话含义理论和 Sperber & Wilson(1986)的关联理论,这些都是对语用推理的宏观纲领性分析,虽然有道理,但并未把具体的过程描绘出来。古典逻辑学的谓词逻辑部分的操作对象是单句的命题,命题逻辑则以合取、析取等命题连接逻辑算子为支架,在诸命题之间进行理论数学般的符号运算,这是数理逻辑学的初衷,玩弄的是纯符号游戏,如“小王在家或新西兰在南半球”等。

然而逻辑毕竟只能解决自然语言的一小部分问题,逻辑和自然语言的巨大差异,使得用逻辑来描写语言的使用变得异常困难。逻辑有直接性、单纯性、可靠性、完全性等特点,从而导致逻辑推理的有效性和后承性。而自然语言既有直接的语义解释也有间接的语义解释,且句法规则非常丰富多彩。也就是说,语言具有模糊性,而用来描写语言状态和过程的逻辑却是严格的体系,似乎只能描述语言的一小部分。如把逻辑式强加在语言形式上,就可能会产生张冠李戴的结果。

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导致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的不同的形式化模拟。对语言使用的形式化研究,比较早的有 Gazdar(1979:7-11)的形式语用学理论,具体做法是罗列本体基质,解释逻辑因素,用严谨的运算和评估来证实含义推导的效度。后来哲学界、数学界、逻辑界、人工智能界、语言学界的 Heim(1983)、Barwise &

Perry (1983)、Kamp & Reyle (1993)、Gabbay (1996)、Kadmon (2001)等学者,在语用推理方面作出了进一步的努力,使得语用推理形式化的方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比如,Kamp & Reyle (1993)的“话语表征理论”(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 即 DRT),用指称词语的认知可及性(accessibility)的概念,来替代经典逻辑的变项约束关系,从而扩展了语义辖域的概念,导致了动态谓词逻辑的产生,如可用推理中的前提的 DRS(话语表征结构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structure)和结论的 DRS 之间的框架包容关系,来说明自然语言的思维连贯状态,形成后面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的动态语义学性质的微观语境。

微观语境理论擅长处理句子之间名词与代词的照应关系以及动词在时间方面的联系,对句子序列的语义分析,采用一种渐进递增的动态方法,从直观的角度展现人们理解语言时的心理认知过程。因此,DRT 能逐渐增添话语语义信息,符合人理解语言的认知过程。DRT 还能揭示名词和代词、时间等跨句指代关系,从而解决了蒙太格语法不能解决的心理现实性问题。于是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的 DRT 分析程序应运而生,逻辑语法的部分语句系统研究,对计算机人工智能科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另一种用逻辑手段来描述语言过程的理论是情境语义学(Barwise & Perry 1983),这种理论对语句的语境因素及命题态度句的认知心理特征给予充分关注,用信息条目的方式来描述自然语言的语义语用现象。

动态语义学(Dynamic Semantics, Gabbay 1996)用加标演绎系统 LDS 来处理与句法相关的 NP 回指、省略等现象时比较好用,但要分析间接回指、回指的多先行词现象、物理语境指示作用、NP 的先设等现象时,就有些困难,原因是先设本身并无真值可言,故只能在话语中定位。而如果用蒙太格语法的扩展模式 FCT( File Change Theory, Heim 1988, 1992)和 DRT 结合来阐述,情况会好一点。

这是因为,定指和不定指的 NP 以及回指的量域及对指称的描写等,都涉及邻近两个小句,用 DRT 和 FCT 理论时所涉及的结构规则和解释规则,可分析否定、回指等现象的内嵌功能、新旧信息的交融等现象(Kadmon 2001:31-41)。此外,(间接)回指的多

先行词等现象,也可用上述形式方案来分析,如给每一小句或命题建立一个文件(file),必要时可纳入含义、句法树等因素,通过文件更新或“换卡”,就可以对诸小句之间的信息连接进行直观描述。也就是说,DRT和FCT是含句法外知识的话语语境的直观表述,含义取消也可在其中得到表述,FCT理论还包含句法树信息。

语言学的形式化研究,一直是有关学界人士们所追求的目标,任何形式化的努力都包括精确、抽象、符号、参数、量化、图式、公式、公理等概念。然而所谓的形式化有两种情况:一是研究的本体或对象是语言的形式,如针对语言形式的生成语法;二是研究方法的形式化,此时强调的是对语言现象的分析、描述和解释的清晰、直观、明确、简洁等效果,有可能再往计算机化的方向努力,如由人工智能研究所产生的机器翻译模型等。

我们所指的形式化,含有第二种意思,形式化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直观地揭示言语功能和信息的传递或运行规律。当然,不同的研究对象,需要用不同的形式方式,才能达到有效的描述目的。既然如此,语言使用也可以用形式化的手段来分析或描述。

这就使我们想起了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辩证关系,这是研究语言形式和语言使用的两种态度或方式。形式主义在本体上仅考虑语言的抽象规则而基本上与意义分开,在方法论上则通过符号、参数、量化、公式、公理、图式等方式,来抽象地或精确地描述所研究的语言对象;而功能主义既考虑语言的意义和社会交际功能,也涉及对语言形式和语言形式产生的动因或理据的象似性研究(如认知语言学)。假如用形式化的手段来研究功能主义的这些方面,就可能产生形式功能语言学和形式认知语言学,也就是说用形式的方案研究语言使用,完全可以使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在操作上结合起来(Croft 1991,1995; Newmeyer 1998)。

把复杂的现象用直观的方法表述出来,是一种形式化的手段。在科学领域内,对数理化形式化研究的崇拜,导致生物学、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的还原主义的尝试,即在研究或分析时,可以用低级、原始或简单的方式,来描述或模拟认知等高级的过程和状态。机械主义和计算主义,就是试图用低级物质的运动形式(如开关电路)和工作机制,通过机械的规则演算,来说明高级物质的运动形式(如语用推理),从而产生信息加工心

理学和人工智能中计算机隐喻的结局。

我们认为,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了“能量守恒”定律,这是一种此多彼少和此少彼多但总量不变的现象,用形式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可能会丧失细节,但既要保留语言细节又要超越真值的语义学和动态逻辑学,研究语言所用的理论又不可能十分严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尽量寻找比较合理的平衡和折中。

还有,假如要用计算机来对自然语言进行处理,就必须把所要研究的言语对象,先在语言学范围内加以形式化,即通过某种数学模型,将所要分析的言语材料形式先严密地表示出来,然后再通过某种算法编写相应的计算机程序,使其在计算机上形式化或转换成各种实用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为了建立这些系统,需要音位学、形态学、词汇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方面的知识(冯志伟 2005)。

因此,本书不讨论机化问题,而是把研究焦点主要放在语用推理的理论探讨上,这样做一是考虑理论的重要性,二是受到数理逻辑知识和研究范围等种种限制。在研究语用推理所必须涉及的言语的语义和语用的界面知识时,为了达到把这种知识表述清楚的目的,我们也借助形式化的方式来表述,并探讨与语言使用相关的若干种自然逻辑形式以及这些逻辑的运作状态,但这样做仅仅是理论的尝试,并无建立可以在计算机上处理自然语言的数学逻辑模型的意图,即使在形式化表述方面,本书也采取以简代繁的处理方式,尽量让读者能看懂本书中用到的数量有限的符号运算公式,而且力求做到不是为公式而公式,而是在必要时才启用公式。

对语用推理的研究,应该从对语言隐性信息在性质和操作上的(重新)思辨开始,即必须事先探讨语言符号的性质。Morris (1938,1946)曾把符号学分成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种,说是句法学研究的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的是符号和符号在真实世界或可能世界中的所指之间的关系,语用学则研究语言符号和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以这种界定为出发点,我们认为,语义学中静态的符号关系,可以称作是语言意义,语用学中的动态的符号关系即语言使用时所产生的附加意义,可以称为

言语意义,言语意义是超越了静态的语言意义的意义。

比如在具体场合内说“水”,说话人想表达的并非是“水”的语言意义,如氢氧结合或液体等,而可能是“要喝水”、“拿水来”等言语意义或含义,而确切含义的解释,须参照具体的语境因素,语境包括人物、场合、关系等多种语言使用者因素。结合这些因素,按一定的规律推导出语言使用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或含义,就是语用推理要研究的对象,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把有关过程和规律描述得细致一点。

比如含义理论对语用推理过程的描述不足,关联理论进行了补偿分析。而当关联理论的若干概念不可论证时,逆证理论提出了相应的论证方案,缺省逻辑作出了有相当细度的阐述,分解的话语表征理论,又进一步将话语结构和逻辑结构分开来进行表述,这些都是由粗向细发展的分析流程,也是本书会展开的内容。

熊学亮

2006年9月18日

## 1.1 语言符号的交际模式

语言符号是形式和内容的结合体, Saussure (1916) 把语言符号分析成声音形象(形式)和概念(内容)结合的两面体。他认为在语言出现之前, 声音和概念都不清楚, 是语言对混沌的声音世界和概念世界进行的系统的切分, 将某段声音和某段概念联系起来, 形成了语言符号, 且这种联系主要是任意的。语言符号形成后, 与语言系统中的其它符号产生对照反差, 故取得了系统价值。因此语言仅是一种关系, 形义构成的基本符号是基础, 基本符号和其它基本符号的反差, 形成基本符号的系统价值。

由于声音形象是对具体声音的抽象, 概念是赋予声音形象的特定意义部分, 故声音形象和概念仅构成符号的两面关系, 并一起形成与其它符号对照的系统关系, 因此语言只是一种形式系统, 与物质或实体是脱离的。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抽象的语言符号在语言使用时, 具有音位性(phonemic)的声音形象被兑现成了具体的语音, 特定的声音形象在不同的语音组合或语言环境中, 会被兑现成不同的语音变体, 如/p/音位(声音形象)在词首出现且后面紧跟重读的元音时(如 pat 等), 便兑现成送气的[p<sup>h</sup>]音, 在词尾出现便兑现成不送气的[p.]音(如 stop 等), 在其它语音环境中出现(如 potato, spot, spring 等), 则被兑现成半送气的[p-]音。此外, 特定的声音形象也会在不同的语用者或发音人那里被兑现成不同的语音, 产生个人的发音变体。

声音形象的不同发音变体, 在语言使用中不会被误解, 是因为声音形象的音位性在起着辨别意义的作用, 是音位和音位的差异, 保证了语用者在语流中分辨语音差异的能力。同样, 符号的

概念面所涉及的概念,是概念世界中的特定一部分,在语言使用中,此段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通常会与局部语境和宏观语境结合或互动,产生种种意义的变体。也正是由于符号中已记录的抽象概念的恒定性,使得语用者能在并非完整、颇受干扰的语流中,毫不费力地分辨出诸概念意义之间的差别,从而恰如其分地理解言语的要旨。

语言符号的价值,就是语言符号的意义或内容,符号的形式和内容的配置因语言而异,比如英语 mutton 和法语 mouton 在价值或内容上并不等值,前者仅表示“羊肉”的概念,而后者却可以同时表示“羊肉”和“羊”这两种概念,而这两种概念涉及“牲畜肉”和“牲畜”两个相邻的语义场。因此,mouton 的交际负担更重,分辨度更低。

符号的系统价值或意义,可以用家庭成员的价值来类比,如家庭子系统中有父母和孩子共三人,每人在该系统中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一旦其中一个成员从这个系统中消失(比如母亲出国进修),剩下两个成员的价值量(如父亲)就要重新分配,每人的价值或每人要行使的功能责任或承担的义务便会增加。价值或意义给特定的词语概念划定了范围,产生了语言符号意义的外延,符号意义外延规定了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差异,从而成为语言交际中交际者分辨意义的关键。

比如,人可以使用“集成电路片”、“萨斯病”、“痛风”、“复方酮康唑”等词语,成功地将这些词语所携带的信息传递给他人,即人可以用这些符号进行成功的语言交际,但使用这些符号的交际者,对这些符号的意义、内涵或内部语义结构并非都了解得很透彻。不懂它们的意思,也不会影响人们用这些词汇进行有效的交际,是因为在语言交际时,所使用的是词语相应的系统价值,仅把词语当成一种形式载体或标签,因此说一般人主要按词语在相应系统中的价值即词语的外延进行交际,也不为过分。

上述分析解释了 Saussure 的“语言中只有差异”(in language there is only difference)、“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language is form, not substance)、“语言的意义是消极定义的”(the meaning of language is negatively defined)等符号学的关键命题。

其它的例子还有,汉语用 7 种中心色词语来分割可见光域,英

语则用 11 种中心色词语来分割相同的光域 (Rosch 1973)。“红色”的概念很难进行内涵定义,且“专家知识”也认定无单一或无仅属于该色的波谱。但外延定义就比较有效,红色之所以是红色,因为在可见光谱域(或同一色谱语义场)内,其它颜色不是红色,红色便因而获得了价值,而该价值不是积极定义的结果,而是用“同一语义场内其它成分不是它”来消极定义的。消极定义的结果,导致了已定义的词语与同一语义场内的其它词语的辨认差异,故“语言只有差异”的说法便得到了佐证。由此可见,语言表达或词语 X 的语言系统价值或意义,就是“同一(语义子)系统内的其它成分不是 X”,或者说 X 的外延是它在相应语义场内的位置的落实。

这一概念在语义学中非常重要,因为探讨 X 的意义,离不开 X 和其它词语的系统关系,意义指的是词义或语言符号意义在语言的关系系统中与其它词语或符号的对照状态和反差关系,这些关系包括同义、反义、矛盾、蕴含、上下文等方面,如 man: woman [ + / - MALE ]、man: boy [ + / - ADULT ]、boy: girl [ + / - MALE ]、woman: girl [ + / - ADULT ]等词语的反义关系,都是一个义素之差的关系,而 man: girl [ + / - MALE ]; [ + / - ADULT ]、woman: boy [ + / - MALE ]; [ + / - ADULT ]等不构成反义关系,是因为彼此相异的义素超过了一个。正是符号在语言系统中有这些反差对象支撑,其符号价值便得到认可,而价值就是上面所说的符号意义。

由于声音形象是对具体声音的语言抽象,概念是赋予声音形象的特定意义部分,故声音形象和概念仅构成符号的两面关系,并一起形成与其它符号对照的系统关系,因此语言只是一种形式系统,与物质或实体是脱离的。将某段声音和某段概念联系起来,形成了语言符号,语言符号形成后,与语言系统中的其它符号产生对照,故取得了价值。因此语言仅是一种关系,形义构成的基本符号是基础,基本符号和其它基本符号的反差,形成基本符号的系统价值。

符号 X 的系统价值确立后,就有一个向内和向外的分析基点问题。向内指的是对 X 内涵或意义内容的语义学探究,往往具有循环定义和难以穷尽等特点。比如对“老虎”概念的内涵进行创

根问底的追究,就会产生循环论证的结局。人能区分“老虎”和其它野兽,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对老虎作出到位的定义和阐释,任何一轮对该词语的定义所包含的因素的追究,都会引起对该因素本身的进一步定义。

词典记录的词语定义,是词语最为典型的义素集合,故并不能穷尽词语的内涵。Carroll(1999:109)认为,对 bachelor 和 spinster 的涵义判断,受到文化定势的影响,虽然两者都可用“未婚”来定义,但 spinster 在英国文化里,显然已过了社会认可的结婚年龄。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打了多年光棍,最近才结婚”,但不能说:“她当了多年老姑娘,最近才结婚”。

传统语义学的“义素”理论,在词语定义方面有“普遍性”的特点,而近代认知语义学的范畴原型理论就纳入了文化因素,故相对比较客观,其客观性在于,对意义的解释还有类似文化等其它因素的介入,因此范畴的划分并非像原来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范畴的原型的属性清单也不可能穷尽,故用论来分析词义,也不可能穷尽其内涵。

所谓的 X 的外向分析,指的是基本符号的系统价值形成后,就成为语言交际的基础。交际意义是符号的价值或意义、符号在使用时产生的隐性信息,以及交际者利用符号来传递交际意图这三者的结合,而隐性信息和交际意图,属于符号价值外向分析的范畴。比如“书”的词典定义,表明的仅是该词语的价值意义的基本勾勒,在具体场合中使用该词语,产生的可能就是“买书”的隐性信息,而如果交际者用“书”的基本概念来表达“买书”的隐性信息,他的交际意图就是“书→买书”。又比如“若干本书”有其词典意义,在任何语境内它的隐性信息都是“非所有的书”,而假如这正好是交际者想要表达的意思,那么他的交际意图便是“若干本书→非所有的书”。由此可见,符号意义的向外分析,涉及符号的有语境和无语境的隐性信息方面,还要考虑所启动的隐性信息与交际者的意图是否吻合。

我们先来分析属内向分析范畴的符号价值或意义的传递过程。

语言交际是符号所载的信息的传递过程,这是把载有或编入特定信息(如符号意义)的信号(即符号)从一个终端传到另一个

终端的过程。因为传递信号的目的是为了传递信息,对信号所载的信息就有一个编码(即在信号中编入信息)和解码(即从信号中解载信息)这两大步骤。说话的目的并非仅是为了产生语音,而是传递信息,就好比民航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其目的并非是为飞而飞,而是以载人或载货为目的。这里飞机就好比是信号,乘客或货物就好比是信息,这与信号存载和传递信息的状态是相同的(熊学亮 2003a)。

我们可把信息通过信号被传递的过程分解成下列五个步骤:

- ① 将信息编入某种信号(如语言体系);
- ② 选择某种信号传递(即交际)方式;
- ③ 通过某种媒介传递信号;
- ④ 通过某种途径接收信号;
- ⑤ 运用某种知识手段对所接受的信号进行解载处理(即解码)以获取信息。

也可以将此过程表述成下面这种“信号传递信息的流程模式”:

① 编码方式→ ② 传递方式→ ③ 媒介方式→ ④ 接收方式→ ⑤ 解码方式

这种交际模式适合于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如灯光语交际也按下列程序进行:

- ① 事先将信息编入两人约定好的符号体系;  
(两长两短 = 看电影吗? 三长两短 = “看电影”;两长三短 = “不看电影”)
- ② 选择亮手电光这一信号传递方式;
- ③ 通过光传递信号;
- ④ 通过眼睛接收信号;
- ⑤ 运用两人事先约定好了的信号和信息的匹配知识来对所接受的信号(即所见的亮光方式)进行解载处理以获得信息。

从而形成如下的灯光交际过程

A: 两长两短(看电影吗?)

B: 三长两短(看)

两长三短(不看)

语言交际比非语言交际的情况更为复杂。一是语言符号的